

BE CAREFUL
FOR
MY WORDS

听我讲话 要小心

文化名人访谈录

吴虹飞 著

周有光：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

高氏兄弟：为了反抗的艺术；陈其钢：严肃音乐和一首小歌

林少华：邂逅村上春树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何小竹

李西闽：真正恐怖的是人心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张大春：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主流

何小竹：我们这一代是继续奶长大的；徐星：我还很年轻，才50岁；野夫：吾道不孤

关锦鹏：芳华渐老，爱火未灭

陈其钢：严肃音乐和一首小歌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于晓丹：从《光雅集》到《知不足斋丛书》；东西：坐南不望北；阿勒泰的悲剧

窦唯

除了音乐别无所长

东西：坐南不望北

高氏兄弟：为了反抗的艺术

徐星：我还很年轻，才50岁

张大春：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主流

周有光：从世界看向中国；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林少华：邂逅村上春树

崔健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阿勒泰的悲剧

李娟

关锦鹏：芳华渐老，爱火未灭

李：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余世存：为老子作传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于晓丹：从《光雅集》到《知不足斋丛书》；东西：坐南不望北；阿勒泰的悲剧

陈其钢

严肃音乐和一首小歌

张大春：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主流

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

李西闽：真正恐怖的是人心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余世存：为老子作传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于晓丹：从《光雅集》到《知不足斋丛书》；东西：坐南不望北；阿勒泰的悲剧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我讲话要小心:文化名人访谈录/吴虹飞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430-6340-2

I. ①听… II. ①吴…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
中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006 号

选题策划:琅 川 郭凤岭

著 者:吴虹飞

责任编辑:赵 可

封面设计:姚姚工作室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设计制作:姚姚工作室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历史·见证

- 周有光：从世界看向中国 / 003
- 陈志华：我们是最没有学问的一代人 / 015
- 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 / 021
- 野夫：吾道不孤 / 029
- 余世存：为老子作传 / 039
- 芒克：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 / 051
- 老鬼：血色黄昏 / 057
- 阎丘露薇：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 069

艺术·光华

- 关锦鹏：芳华渐老，爱火未灭 / 081
- 高氏兄弟：为了反抗的艺术 / 095
- 窦唯：除了音乐别无所长 / 105
- 崔健：这是开口的年代，并非开放的年代 / 117
- “舌头”：一支消失的重型摇滚乐队 / 129
- 陈其钢：严肃音乐和一首小歌 / 141
- 曾梵志：我拥有那么多经历 / 155
- 于晓丹：从《洛丽塔》到纽约内衣设计师 / 165

文字·风格

- 张大春：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主流 / 175
-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 183
- 徐星：我还很年轻，才50岁 / 195
- 何小竹：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 / 205
- 米米七月：18岁长成天才少女 / 215
- 林少华：邂逅村上春树 / 223
- 毕飞宇：历史让我们还债 / 229
- 李西闽：真正恐怖的是人心 / 239
- 张铁志：民主让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 247
- 东西：坐南不望北 / 255
- 阿勒泰的李娟 / 261
- 骆以军：写作就是与世为敌 / 273



历史·见证

BE CAREFUL
FOR
MY WORDS



丨周有光丨从世界看向中国

外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像我这种从美国回来的，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的！

眼前的小书桌失掉了大半黄色的漆，露出了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

眉毛已经完全没有了，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就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有些调皮的，“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待在桌前坐定，周有光摘下眼镜，和上书，将台灯些微推开，拿出助听器戴上，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五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岔开，很认真的。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他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他推行简化字，却又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完全有资格对着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到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到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

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改革开放之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四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我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不在乎这些，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了，我是过过好的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去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也回来了。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都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惊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地。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后来‘文革’就没有稿费了，后来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稿费跟50年代的稿费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你要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在国民党里面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是做官早做官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也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不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跟我说，你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19个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

“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我不喜欢官场那一套，我老伴儿也特别不喜欢我搞政治，有的人觉得我太古怪了。”

“人家看我老头子了，105岁，常常问我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所有的

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都是前进的，问题就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80岁的张允和回忆起昔日恋爱情景，写下了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净了罪恶”，但从此以后，“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提到这篇文章，笑：“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的。”“我的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了93这个数字，画了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曲终人不散》，是允和的自述文集，送给记者，署名是“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亦是质朴情深。

吴虹飞：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生活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是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老伴的曾祖父真正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官大得不得了，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一个女子中学，一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进这个学校，跟我的妹妹是同班同学，她到我家里玩，是很普通的事，我们很早就认得了。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苏州阶段，那时候放假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就多了一点；最奇怪是杭州又碰到一起，我的老师让我到杭州帮他办一个学校，我的老伴本来在上海吴淞公学读书，江苏和浙江的军阀打仗，炸了铁路，不能去上海了，只能到苏州借读。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我们就到外国去了。沈从文跟三妹的恋爱情况是另一

种，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很不高兴，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的思想很开放，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这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去讲一讲？三妹听了气得不得了，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还是一封一封的。他们在上海的时候还不好，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说我一点不用追的，我跟老伴是流水式的慢慢好起来，他是冲击性的，恋爱方式完全不一样。

吴虹飞：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打穷了。那时候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给我回了十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三年了。他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吴虹飞：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金钱对于婚姻可以说是重要也可以说是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而结婚，也有人为了钱而闹离婚，离婚是现在社会很严重的问题。钱是恋爱以外的东西，把经济问题牵扯到婚姻问题里，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为什么许多人离婚呢，因为结婚之后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喝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好像很小的一件事，表示双方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比较圆满，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常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我们吵架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还有我们吵架都是为别

人的事情，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情。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吴虹飞：沈从文先生是您的连襟，在北京时两家常常互相走动，您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

周有光：沈从文和我的关系很好，可是他的教育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在常州、苏州、上海这些现代化比较早的地方，六岁直接进的是洋学堂，没有去过私塾。洋学堂很有趣味，男工带着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拉，扑隆通，菩萨的头就滚下来，庙就变成小学校。沈从文跟我不一样，他在湘西这种落后地方，小学都没有进过，他的新思想都是自己买新杂志，自己学的。我们俩的共同点就是学问基本都靠自修，但还是不一样，我提倡拼音，沈从文不赞成，他见我用拼音，用打字机，就说这么写文章怎么行，文章写不好的！他一定用纸笔的。

他很有趣味，共产党来了，他因为写的小说思想自由，被郭沫若骂，就到故宫当解说员，人家说这是故宫最低的职位，他很高兴，说不然我就看不到那许多古董了！他利用这个写服装史，完全按科学方法来写，写得多好！

汉字拼音化要多久？等五百年吧！

吴虹飞：最近一个律师说，像“娱”、“耍”、“婪”、“嫉”、“妒”、“嫌”、“佞”、“妄”等用“女”部首做形旁的字，是对女性，尤其是对劳动妇女的歧视和侮辱，建议将这些字进行改动。这个情况引起了一些争议，一种是认为他所说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表示支持，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割裂历史的想法，至于要造新字来代替，根本没有可行性。您以为呢？

周有光：汉字是古代人慢慢地创造的，古代男女是不平等的，有人讲，女人是人类当中最早做奴隶的，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汉字的创造主要在男性中心社会，许多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坏的字都是女字旁，当时社会的落后情况在创造汉字时候遗留下来，这叫历史的化石，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当时的历史，这种坏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很不合理，可是汉字用惯了，就无所谓。汉字其实是不合理的事情，但人家那么捧它，崇拜它，是个习惯的事情。

我40年代在美国的时候，有学问的人也都讲究字写出来要漂亮，80年代我再到美国去，发现情况不一样了，书法变成了一个专门技能，普通人不学了，很有名的教授写出来的字难看死了！

吴虹飞：您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意音）时期。请问先生，这三个历史时期是不是一种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稳定下来比较客观的看法，把它分三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好。汉字是古典文字，古典这个字是翻译过来的，classic，有古典的含义，更多的是成熟的含义，优雅的含义，高贵的含义，这是个好词。从历史看，重要的古典文字有汉字，两河流域的楔形字，我叫它丁形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失传了，差不多六百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花了工夫把它认出来，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出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解释，他们还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我在《人类文字发展史》里都写了，列举了主要的符号，中国没有几个人来看我这个书，那么大的一个展览会没有玛雅文的解释，真是一个大缺点嘛！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就有了字母文字，其实很早就产生了，许多人都说中国文化是最古的，其实我们比最古的古代埃及文化，差了两千年呢，甲骨文三千五百年，他们五千五百年，比我们早两千多年，古埃及的文字成熟后产生了字母，字母是高度思维的结果，是发展趋势。到咱们国家，有人写文章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说汉字要拼音化是误解。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打手机（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困难。80年代我到美洲、欧洲去讲学，有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一千个？他以为一千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七千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它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

写，还要你能看懂，一百年后的人也能看懂，拼音要真正成为文字被大家使用，需要几百年，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就说你等五百年吧！今天的中国有广义的拼音化，没有狭义的拼音化。

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

吴虹飞：您曾举出文艺复兴的例子来说明现在的“国学热”（您不同意称之为“国学”，而是称之为“华夏文化”）是“温故而知新”，把古代的旧文化的精华拿出来加以提高和发展，再有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这种热潮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写文章说不要用“国学”两个字，这是一种保守的印象，什么叫“国学”？只能中国有“国学”吗？我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两个字。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要温故而知新，这句话非常重要。文艺复兴，就是欧洲文化落后了，他们要发展，就研究古希腊著作，从中吸收新的启示。近来复古风很厉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夫子说“学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学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又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其实是谨慎，他说不要创造，先把古代的学好，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跟现代来挂钩。

前几年这种热潮的代表是于丹，她红得不得了，为什么红？不是她有什么大的本事，而是“文革”之后，中国成了一个文化的荒原，许多人就开始思考，特别是《光明日报》，80年代，大概是台湾捐了一百万块钱，邀请中国的学者写怀念中国古代的文化，也请了我，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后来出了一本书，叫《龙吟》，可以说今天看大部分写得不太好，后来大家的水平慢慢好起来。于丹赶上了大家对文化需要的这个浪潮，大家需要知道中国的历史，不是胡说八道的历史，而是真的历史，还有中国的哲学；于丹碰上了机会，是个代表。很多人批评她，评论她的书和文章都有人给我看，让我发表意见，我

说我不发表，你们吵吧，我不参加。后来我说她还是一个青年，当时还是一个副教授，水平不是很高，你要原谅她，她普及古代文化是好的事情，讲得对不对可以再研究。我说于丹是“给许多需要文化的人喝了一杯文化的甜酒”，是恭维她，也不是恭维她，把她捧得很高不对，把她压得很低也不对。

我们今天要发展现代儒学，这也要根据温故知新的原理，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古代一个外国。

吴虹飞：在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注重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日本美国都去过，后来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我就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把文字改革运动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我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八十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这个学问扩大到世界。什么东西都要从世界看，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里面有一段话很对，大意说过去我们都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在我们这里还不行，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了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这对学术上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历史学，最近欧洲闹得很厉害，波兰把苏联红军纪念碑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墓地，俄罗斯说你们忘了我解放你们的功劳，波兰说你跟希特勒订下密约要瓜分我。用全球化的眼光写历史，看法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不能随便讲爱国不好，那还得了？但这个思想已经传到香港了，他们说我们爱国不爱党，我听了就吓了一跳。

世界文化有四个传统，东亚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南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

西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西欧文化以罗马希腊为中心。这四种文化传统往来多了，好的东西大家用，产生一种大家共同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两个层次的文化，上层是部分地区的普遍文化，比如民主；下面是四个传统文化，就像一个桌子，上面一个共同的面，下面四个桌脚，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了，文化不分国家。苏联把学问分成了阶级，创造马列语言学，后来自己否定了。很多人觉得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苏联代表一条道路，美国代表另一条，国民党曾想找到第三条，没有找到；后来共产党选择苏联道路，苏联失败了，证明历史只有一条公共的发展道路。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的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这种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吴虹飞：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有好多角度可以看，主要是三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三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东西，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的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也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以前人家都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手机都要用拼音打字！信息化我们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三千多年以前古代希腊就有了，可的确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因为它从殖民地起来。欧洲传统势力大，社会里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了，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早上看到太阳东方升起，晚上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虹飞：您觉得当下的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总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民主最早开创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大选首相要开始电视辩论了；还有国际观察，在国际上有三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真的假的看得很清楚。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民主。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殖民地人民天天跟你闹，哪里有完？美国不要殖民地，它打赢了西班牙也不要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而是把它扶植成独立国家，他用技术的创新来代替殖民，用许多新的方法来赚你的钱，比以前那种剥削还要厉害，你还要感激它。最近我们跟美国吵架，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所以他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它花三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让军队都失效了，不到一个礼拜美国的坦克就开到王宫。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看，买不到。上一次的《泰坦尼克号》，赚的钱比全日本所有工厂一年盈利加起来还要多，它不掠夺，它赚得很多，也给你赚一点，让你没有话说，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女儿就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出了个题目，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像这样做坏事情。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从外国回来的这个教授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资本主义国家有坏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情的！这个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这叫思

想引导！后来有两个中学教师来看我，我就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思想引导，他们说是奉命搞思想引导的！这显然就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我们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儒学的教训非常重要，假如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张莹莹对本文有帮助）

